



大会

第七十七届会议

正式纪录

第**八十四**次全体会议
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克勒希先生 (匈牙利)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88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余留职能

秘书长的报告 (A/77/789)

决议草案 (A/77/L.76)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请德国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77/L.76。

哈塞瑙先生 (德国) (以英语发言)：德国荣幸地以主要捐助方小组现任主席的身份在议程项目88下介绍决议草案A/77/L.76，该小组是为支持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而组建的。我以这一身份代表柬埔寨以及该小组的成员——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挪威、大韩民国、瑞典、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发言。

20年前，应柬埔寨政府的请求，联合国帮助设立了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这是一个起诉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所犯罪行的柬埔寨特别司法机构。自那以来，特别法庭追究了若干被告对红色高棉暴行的责任，对问责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法庭在公开审判中进行追责，通过民事当事方的广泛参与，为受

害者提供了诉诸司法的机会。特别法庭的成就包括与国内法院系统有关的法律能力建设，以及加强向受害者和民事当事方提供援助的民间社会组织。最后，特别法庭促进了柬埔寨关于红色高棉罪行和时期的公开讨论，包括在公共教育系统的课程中反思红色高棉的历史。审判阶段完成后，特别法庭开始了重要的余留阶段。这一阶段包括执行司法命令、管理法庭档案和传播信息等工作。

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对于确保继续顺利行使这些余留职能很重要。柬埔寨和主要捐助方小组继续努力为之提供便利。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在柬埔寨和国际上保护法庭的遗产，包括在我们打击国际法规定的核心罪行不受惩罚现象的斗争中，利用从特别法庭工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易夫人 (柬埔寨)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审议关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决议草案A/77/L.76。也请允许我对主要捐助方小组特别是德国提出和联署这项决议草案表示高度赞赏。

从1975年4月17日至1979年1月6日，柬埔寨人民生活在众所周知的红色高棉政权之下。该政权剥夺了我国各种形式的人权。大约三分之一的柬埔寨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民众死于处决、饥饿和疾病。1998年实现全面和平后，柬埔寨王国政府请求联合国支持追究在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时期所犯罪行的责任。

2006年设立了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为红色高棉政权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伸张正义。该混合法庭履行职责，判定三名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犯下了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去年，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的国家元首乔森潘被判处终身监禁，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完成了它的主要职能。现在，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仍有余留职能要履行。

我谨感谢秘书长的领导和他在文件A/77/789中的报告，该报告全面概述了法院的工作、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在法律和道德上承认了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犯下的罪行并追究这些罪行的责任。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同时，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可以带着一种了结的心情展望未来，因为正义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伤口正在愈合，尽管伤疤依然存在。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帮助促成的和解使我们的国家能够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和平和光明的未来。

过去17年来，在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参加庭审的人数空前之多，确切地说是24万人，还有更多的人观看了电视直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余留职能旨在保护其遗产，确保这个非同寻常的法庭的工作在其司法程序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允许公众广泛查阅其档案和传播有关其工作的信息，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使后代能够深刻了解柬埔寨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并防止今后再次发生同样的悲剧。

最后，我谨转达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特别是主要捐助方小组的感谢，感谢它们继续向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提供资金、技术和道义支持。它们对关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余留职能的决议草案A/77/L.76的支持，反映了对法庭成就及其余留职能重要性的认可，这些余留职能确保法庭完成工作，包括赔偿和支持受害者。

Hoang Nguyen Nguyen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德国代表团介绍关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决议草案A/77/L.76。

在法院作出判决将近五年、法院作出最后裁决将近一年之后，这个项目依然列在大会议程上，这表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仍具有相关性，其遗产仍具有重要意义。

法院的诉讼程序和结果虽然来得迟，但却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最终为包括柬埔寨人和越南人在内的千百万无辜受害者及其家属伸张了正义。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也是早该到来的平反，证明越南进行自卫及随后与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联合力量终结波尔布特灭绝种族政权是正义之举。

不幸的是，这一事实在当时被政治化了，越南因此被错误地制裁了许多年。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是坚持以国际法为准绳的典范，并有力地提醒我们，暴行罪，特别是灭绝种族罪，必须且必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本着这一精神，越南欢迎支持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余留阶段工作的最新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就题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余留职能”的决议草案A/77/L.76作出决定。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A/77/L.76获得通过（第77/299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88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了。

议程项目128（续）

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

决议草案（A/77/L.77）

主席 (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开始就这些提议采取行动之前, 我谨通知各位成员, 大会将就这个项目举行辩论, 具体日期待宣布。

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77/L.77。

德拉富恩特·拉米雷斯先生 (墨西哥) (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 我荣幸地代表我国介绍决议草案 A/77/L.77, 它涉及墨西哥在各种论坛上强调过的一个问题：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这一重要议题。

首先, 我谨感谢并肯定组成提交决议草案供大会审议的核心小组的各代表团：阿根廷、加拿大、以色列、日本和摩洛哥。他们的贡献对于弥合立场间差距和充实案文至关重要。

我还要感谢各代表团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我们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的目标是明确强调确保包容性地获得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的重要性。当然, 这是一个旨在将该议题列入多边议程的范围更广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符合安全理事会2022年12月一致通过的第2668 (2022) 号决议。

认识到精神卫生的重要性, 意味着也认识到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有权享有尊严和全面健康。在谈判过程中, 对于如何提及或理解精神卫生本身或社会心理残疾等概念, 很显然存在不同观点。不过, 从一开始也显而易见的是, 就这些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

当然, 各种优先事项必须放在首位——例如, 消除对有某种精神卫生问题或社会心理残疾的人的污名和歧视, 并确保我们强调他们需要也有权利获得社会心理支助服务。

决议草案还强调, 必须避免任何种类或任何形式的歧视或污名化。墨西哥历来是社会心理残疾者的盟友。2001年, 我们向大会提议起草一项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具体公约。今天, 我们重申, 我们致

力于尊重和保护残疾人乃至所有人的人权, 不遗漏任何人。

我还要指出, 并非所有精神卫生问题都会导致残疾。当然, 获得社会心理支持服务、社区服务、来自同伴的支持, 以及有时使用安全有效的药物, 使人们能够在平等、积极和参与的基础上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解决精神卫生问题也意味着消除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医学方法和人权视角并不相互排斥。相反, 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为了维护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全面健康, 我们必须同样严谨地看待医学领域的进步和所有人的人权方面的进步。

我们今天将要通过的决议草案以明确和平衡的方式处理所有这些敏感和微妙的问题。但是, 仅仅通过该决议草案是不够的。虽然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我们仍须持续取得进展, 直到精神卫生成为全民医保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 这不仅是要从人权角度, 以基于性别的方法确保人们得享医疗服务。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关注影响人们健康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 采取预防性方法, 并根据人们的生活条件, 提供有效的护理服务。

今天, 大会有史以来首次通过一项决议草案, 尊崇精神健康, 保护人权, 并呼吁给予所有人不受排斥地享有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服务的权利。因此, 我请所有代表团加入协商一致意见, 一道联署这项前所未有的重要草案。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它呼吁采取行动, 将决议草案的内容化为现实。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着手审议决议草案 A/77/L.77。

我现在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中野先生 (大会和会议管理部) (以英语发言)：我谨宣布, 自决议草案 A/77/L.77 提交以来, 除该文件中所列代表团外, 下列国家也已成为共同提案国：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黑山、纳米比亚、荷兰王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萨摩亚、圣马力诺、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图瓦卢、乌克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就题为“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决议草案A/77/L.77采取行动。

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中野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言）：下列说明是在大会议事规则第153条的框架内作出的。

根据决议草案A/77/L.77执行部分最后一段的规定，大会将请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其他相关机构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密切协作，在大会第八十八届会议期间就本决议草案的执行情况提交一份进度报告。

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最后一段所载的要求将增加大会和会议管理部2025年的文件工作量，即以所有六种语文印发一份8500字的会前文件，并且需要在2025年增加24500美元非经常性经费。

因此，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A/77/L.77，2025年拟议方案预算第2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项下所需追加的24500美元经费将列入2025年拟议方案预算，供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审议。

我刚才宣读的说明也将在《联合国日刊》本次会议的电子发言稿链接下刊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A/77/L.77？

决议草案A/77/L.77获得通过（第77/300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希望在决议草案通过后解释立场的代表发言之前，我谨提醒各代表团，解释投票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Skoglund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欧洲联盟（欧盟）及其27个成员国的名义发言。候选国北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潜在候选国格鲁吉亚；以及摩纳哥均赞同本次发言。

就在三年多前，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席卷全球，经济和社会陷入停滞。这场大流行病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在应对如此严重的卫生挑战时，我们需要在全球一级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它凸显了国际协调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正在承受这场大流行病给精神健康造成的长期后果，这些后果常常影响到儿童和青少年，而且对太多人来说，这加剧了战争、冲突和危机对心理健康的灾难性影响。欧盟成员国共同联署了第77/300号决议，并高兴地加入了该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我们感谢墨西哥、阿根廷、日本、加拿大、以色列和摩洛哥努力在联合国宣传精神健康问题，并适时地向大会提交了这份案文。我们还感谢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讨论期间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

该决议第一次提请全体会议注意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对可持续发展与和平所起的促进作用这一问题。我们赞赏该决议强化精神健康的健康和人权视角，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它以世卫组织在精神健康方面所做的广泛工作和人权理事会相关决议为基础，旨在消除精神健康方面的污名化、歧视和暴

力, 尊重、保护和实现精神健康疾病患者和社会心理残疾者的人权。

欧盟及其成员国显著加强了解决精神健康问题的努力。我们努力促进福祉, 预防精神疾病, 确保提供优质护理, 并增加获得精神健康服务的机会。及时的支持对于处理精神健康问题至关重要, 欧盟强调采取全面的预防、早期干预和综合护理办法的必要性。

几周前, 在6月7日, 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精神卫生的全面战略, 该战略采取以人权为基础的整体方法, 并基于三项指导原则: 充分有效预防; 获得高质量、廉宜的精神卫生护理和治疗; 康复后重新融入社会。

技术、环境和社会瞬息万变, 对人以及人的应对能力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整体方法认识到精神卫生不仅仅是卫生问题, 还涉及教育、数字化、就业、研究、城市发展、环境和气候等领域。这一战略是与欧盟成员国、利益攸关方和公民进行广泛磋商后制定的, 并确定了20项有专项资金的精神卫生旗舰举措。

精神卫生将在我们的全球努力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了精神卫生支持。仅举一例, 这项新战略承诺为流离失所者和受影响者提供精神卫生服务, 并传播分发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最基本服务包》。

更广泛地说, 为应对危机, 需要将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等对待。去年11月, 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新的欧盟全球卫生战略。该战略推出了多种行动, 旨在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卫生不平等问题并应对大流行病时代的卫生威胁。战略通过一个新的、广泛的全球卫生议程来总结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重要经验教训。它促进卫生工作, 并将精神卫生纳入全民健康覆盖, 这是欧盟对外行动和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支柱。

该战略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优先事项: 第一, 加大努力提供更好的贯穿一生的保健; 第二, 加强卫生系统, 推进全民健康覆盖; 第三, 预防和抗击包括大流行病在内的卫生威胁。

欧盟认识到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我们提倡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来应对精神卫生问题。研究和知识交流是我们各项战略的核心。我们认识到循证做法的重要性, 并寻求通过开展科学探索、促进协作和分享见解来提高我们对精神卫生的认识, 从而为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欧洲联盟将精神卫生作为内外政策的优先事项, 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包容的社会。确保提供便于获取的高质量精神卫生服务并消除污名和歧视, 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关键, 更广泛地说, 也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

通过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环境, 让个人得到支持, 污名被根除, 精神卫生被确认为整体健康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努力确保没有任何人掉队, 确保精神卫生真正成为我们各方的优先事项。

布赛义迪先生(阿曼)(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各代表团, 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卡塔尔国、科威特国和我国阿曼苏丹国发言。

首先, 我们各国感谢并赞赏墨西哥代表团努力促进今天通过的第77/300号决议。我们还要赞扬召集人作出努力并在谈判期间听取各种观点时表现出灵活性。

海合会国家各代表团加入了关于该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 因为我们认为决议涉及的精神卫生这一议题非常重要, 我们各国也对此议题非常感兴趣。

该决议是向大会提交的第一份此类决议, 涉及精神卫生及其社会心理影响。然而, 关于决议也涉及的所谓“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问题, 海合会各

国代表团强调, 我们根据我们各国的国家法律和规定并在各自文化和社会框架内来看待这一问题。

科拉克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国和我国美国发言。

我们高兴地成为题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第77/300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而且就我国而言, 我们加入了有关该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 这是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关于精神卫生的决议。我们谨感谢墨西哥和核心小组成员在这一借鉴了人权理事会最近各项决议的重要举措上发挥领导作用。

社会心理残疾是人的经历的自然组成部分, 反映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美好的多样性。然而, 社会心理残疾者常常遭遇范围广泛的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行径, 甚至包括任意或非法剥夺自由、基于残疾交送专门机构治疗以及其他胁迫性有害做法。

几十年来, 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和系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各种努力往往围绕着残疾的医学模式, 导致偏向生物医学干预、医学化和交送专门机构治疗的方法占了主导地位。

我们有责任认识到, 歧视和胁迫性治疗不是应对社会心理残疾的适当方法。社会心理残疾不应被描述为一种失调。我们必须接受促进理解、接受和支持的包容性方法, 充分尊重所有人的多种多样的精神健全。我们赞赏这项重要决议接受这种方法, 而摒弃一种过时的模式——将社会心理残疾视为一个应在临床上定义和治疗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 这种模式可能会引发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残疾人权利公约》为精神卫生领域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基础。我们感谢今天在此提交的决议肯定这一转变, 在实行去机构化和护理模式的势头基础上再接再厉, 这些模式触及精神卫生的根本决定因素, 提供基于社区的有效精神卫生服务和社会心理支持, 减少精神卫生环境中的权力不对称现象, 尊重社会心理残疾者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自主权。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 该决议遵循了特别报告员代纽斯·普拉斯在其关于精神卫生的2017年里程碑报告 (A/72/137) 中的路线, 并遵循人权理事会先前的做法, 包括理事会最近就该主题所通过决议 (A/HRC/RES/52/12) 中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 决议应与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原则保持一致, 并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

我们重申, 精神卫生和健康状况是否良好不能以没有社会心理残疾来界定, 而应以个人和民众是否能在有尊严、可充分享有人权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来定义。

因此, 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推进该决议, 为此而提供基于社区、循证和维护人权的服务和支持, 同时尊重、保护和实现社会心理残疾者的人权、自主权、意愿和偏好。

我们谨重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变革承诺, 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我们始终深感关切的是, 土著人民常常遭受比例尤其之高的社会心理困扰和自杀。我们欣见, 该决议确认需要支持对土著人民的社会和情感健康采取整体的办法, 包括通过与土地、文化、精神和祖先的联系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还强调, 患有心理社会残疾的各种背景的妇女和女童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虐待、歧视和负面成见。此外, 患有心理社会残疾的妇女和女童往往面临环境、态度和体制障碍, 这些都剥夺了她们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我们呼吁会员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确保人们获得促进性别平等的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 包括在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

我们本来还希望看到该决议处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面临的共同障碍和独特障碍, 包括多种相互交错的歧视形式。有证据表明, 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在精神卫生方面存在差异, 并面临更大的暴力和虐待风险, 包括在医疗环境中。我们重申联合国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

性别者和间性者核心小组呼吁通过和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以注重公平和基于人权的办法处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健康和福祉问题的建议。

最后，我们感谢墨西哥共同协调这一进程。该决议是运用有关心理社会残疾和精神卫生的社会和基于权利的模式的重要一步。我们感谢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这方面的努力，同时也认识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执行该决议，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确保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全球优先事项。

博尼利亚·阿拉尔孔夫人（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墨西哥代表团介绍和推动这项重要的第77/300号决议。危地马拉致力于继续努力确保健康生活，促进人在所有年龄段的福祉，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3不仅与身体健康有关，也与精神卫生有关，是我们的优先目标之一。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和疫情过后，促进精神卫生成为了一个优先问题，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个使人们能够适应冲突局势、并以更强大的姿态走出冲突的过程。

危地马拉支持题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决议。然而，我们不赞同序言部分第二十八段，这是因为考虑到它包含的措辞违反了我国保护生命和家庭制度的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

危地马拉在合公约性审查的框架内，不加歧视地促进、捍卫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因此，我国对使用明确或隐晦违反危地马拉共和国《政治宪法》及国内法律秩序的措辞、条件和规定持保留意见，包括但不限于与性权利和生殖权利有关的内容。

因此，我们保留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解释“生殖权利”一词的权利，危地马拉认为这不包括堕胎。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解释生殖权利，国际社会没有达成共识，危地马拉有自己的国家法律，只涵盖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政策，不涉及可能被解释为享有堕胎权或堕胎做法权利的生殖权利，这一权利与我国的国家立法相抵触。

加迪尔霍米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加入通过第77/300号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我们要对决议草案非正式协商进程中缺乏透明度表示关切。

我们注意到，最新版本忽略了许多技术意见；尽管会员国在许多段落上存在分歧，但案文还是提交给了大会。我们还注意到，在非正式协商期间取得的进展被忽视，提出的修订在案文各部分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这实际上导致本决议对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说明和描述并不准确。

遗憾的是，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人们的精神卫生和福祉的负面影响现实存在。这种非法措施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阻碍了受影响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儿童和妇女充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妨碍了他们的福祉；损害了他们充分享有人权，包括人人享有健康、福祉和医疗所需的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

此外，这些非法措施妨碍获得药物，包括专门的医疗，并对实现身心健康领域承诺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要表示极其失望的是，尽管许多会员国强烈支持写入直接提到国家强制性措施的拟议措辞，但决议中没有包含这一具体措辞。

关于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赞同这项题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决议的序言部分第八段，尤其是其中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13-203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我们要澄清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决议各项规定的审议和执行取决于我们国家法律、条例、政策和优先事项以及宗教、文化、社会特征和价值观。

波韦达·布里托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作本次发言解释对题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第77/300号决议的立场,该决议由墨西哥代表团推动,并由一组国家联合提交。

首先,委内瑞拉感谢墨西哥代表团推动这一进程,感谢它愿意促进关于各个复杂问题的对话和讨论,并努力在各代表团之间找到折中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尽管我们未能在所有问题上取得这样的折中办法,但联合国各项决议谈判进程的目标是确保各方的意见都被听取,从而制定一份反映所有会员国立场的案文,并尽可能反映它们的具体优先事项和关切。

关于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讨论已在过去联合国各个论坛上强调过,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有了一项与该问题直接相关的决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必须在本组织所有各机构中继续以贯穿各领域的方式加以发展。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本质是一个健康问题,而社会成见、虚假信息和对更多社会关注的需求给这个问题定下了基调。因此需要采取一致和有影响力的行动,从而在有效的多边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各国起草和执行全面的政策,并根据各自的国家和地方实际情况研究这一主题。

2019冠状病毒病紧急情况对精神卫生的影响尤其强烈,因为疫情在人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对所有人,尤其是潜在的最脆弱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优先问题。

在谈判过程中,许多会员国提出了在案文中纳入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影响各国通过国家精神卫生方案有效应对疫情后果等的能力这一问题,并指出,根据国际法,针对经济体和社会的行为就是此类行动,因为它们影响到整个社会,并对身心健康和人类发展产生影响。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第70/1号决议第30段中列入了这方面的规定,这是商定的最起码

的措辞,即必须避免使用此类措施,因为它们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委内瑞拉建议至少列入这一措辞,但即使是这一措辞也不为那些推动该决议的国家所接受。这反映出它们不尊重《2030年议程》,也不符合联合国的精神,特别是因为此时我们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很遥远,甚至在筹备召开一次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讨论如何在我们所剩不多的时间内加快落实该《议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因此,委内瑞拉认为,任何关于健康问题的谈判或文件,如果没有提到这一点,就不能被认为是全面或完整的,因为受到此类非法行为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实际上是健康这一人权,因为它们阻碍人民获得药品、医疗、新技术、疫苗、一般供应链和教育等关键手段,使之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并且使各国无法采取行动,确保这项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委内瑞拉希望,以《2030年议程》为基础的各项建议将被纳入正在为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编写的关于健康问题的政治宣言,并最终商定将这些建议纳入关于精神卫生这一重要问题的后续决议。我们准备为此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西林哥林哥先生(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谨同其他国家一道,感谢墨西哥代表团发挥领导作用,促成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精神卫生问题的大会决议(第77/300号决议)。

我们欢迎该重要决议。尽管如此,我们谨表示不赞同序言部分第十七段,并解释我国对执行部分第17段的立场,内容如下。

第一,精神卫生问题离不开地方和国家背景以及社会价值体系。必须确保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相反,每一种做法都必须因地制宜,符合当地人民的需要,而且必须尊重当地的情况。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解是,本决议所载的所有条款都必须符合当地和国家的状况,而不是与之相抵触。

第二,包括精神卫生在内的医疗卫生问题与经济和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推进这一问题时,必须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卫生系统和应对包括精神卫生在内的所有非传染性疾病方面能力不平衡的问题。

第三,我们对使用某些没有商定定义或明确提法的措辞持保留意见。我们认为,应当避免使用这种措辞,以防出现任何可能妨碍当地有效执行该决议的混淆。

就技术术语而言,印度尼西亚认为,决议应当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关于精神卫生问题的技术术语的建议。这对于确保一致性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该决议承认并大力支持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卫生领导和协调权威机构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印度尼西亚对决议中使用的术语表示保留意见,并将根据世卫组织对精神卫生状况的提法保留该术语,将其作为一个通用术语,包括精神障碍、社会心理残疾和与严重痛苦、功能受损或自残风险有关的其他精神状态。这一理解将适用于所有包含“精神卫生状况和社会心理残疾”这一短语的段落。

穆罕默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埃及代表团欢迎墨西哥代表团倡议将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问题纳入大会讨论。考虑到促进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密切和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我们强调国际社会承诺加强努力,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的一个机会。

埃及继续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最好的身心保健服务。埃及国家坚持不懈地努力发展我国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尽可能好的医疗保健。我们正在扩大我国公民的医疗覆盖面,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医疗保健系统,在为每个人提供全民医疗保健的同时遵循更高标准。

埃及政府已采取若干举措,改善我国公民的精神和心理保健。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开展研究,并将

一般精神病护理扩展到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我们还改善了毒瘾治疗服务。

关于大会今天通过的有关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第77/300号决议,埃及代表团谨发表以下意见。

第一,我们谨强调,尽管就决议草案A/77/L.77的案文进行了长达50多个小时的谈判,但我们只就总共55个段落中的17个段落进行了谈判。各代表团有必要继续就整个案文进行协商,特别是因为这是大会提出的首项此类决议。

此外,在每一轮谈判后都对案文进行了大量修改,包括在谈判结束后修改了决议的标题,遗憾的是,标题中不再提及可持续发展。

第二,埃及代表团谨表示,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一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企图削弱案文的发展方面,在发展案文与人权相关案文之间制造不切实际的竞争,这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我们每个国家多种多样的国情出于一辙,并无二致。

(以英语发言)

有人蓄意企图破坏发展措辞,不考虑各国国情不同这一事实。

(以阿拉伯语发言)

埃及代表团认为,如果国际社会和大会不承认加强卫生系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帮助,可持续发展目标3的落实就会受阻。就埃及而言,它继续致力于在这方面进行建设性国际合作。

第三,在没有进行全面谈判以使各代表团就决议内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埃及代表团强调,它加入共识的目的只是为了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的国际努力。埃及代表团谨指出,它对案文的解释是基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承诺以及埃及的国内立法和国情。我们还要强调各国政府发挥的主要作用。如该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有责任

结合每个国家的国情和优先事项,并根据国家自主原则,决定如何提供全民医疗保险。

Ochoa Espinales女士(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在题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的第77/300号决议通过后,我国代表团愿发言解释我国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谨强调,谈判进程缺乏诚意,因为在两个多月的谈判中28个国家一再提及的立场遭忽视。这个立场就是,必须在决议中列入关于非法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影响的措辞,其中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商定的措辞。

这份文件是大会第一项专门涉及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问题的决议,主要关注的是在这一领域获得适当服务的权利,它还强调了精神健康是全民医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可接受的是,对于不提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负面影响,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显然是实现全民全面医保的障碍。

副主席华莱士先生(牙买加)主持会议。

这是毫无道理的,特别是鉴于一个不可否认、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发展中国家除了在这一领域面临更大挑战之外,还需要获得资金并进行能力建设,以便向其公民提供更好、更全面的一般医疗保健和专门护理。

有20多亿人和40多个国家每天都在遭受非法恐怖主义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实施造成的影响,这些措施不利于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可行贷款和项目,对于这些人和国家,我们不能无视、远离,更不能抛弃。

对于正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消除贫困和实现全民医保尤为重要。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国家每天都在加紧实施这些有害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并将其用在更多的国家身上,这也是一个事实。这些侵略和制裁行径同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为落实《2030年议程》所做的共同努力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因此应该杜绝。

Komarkov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们谨感谢墨西哥提出这一有益的倡议。我们通过了一项关于保护精神健康的决议(第77/300号决议),这在大会历史上尚属首次。

今天,有必要特别关注保护人们心理健康的措施,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在这一领域引发了一场危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大流行的第一年,患有此类疾病的人数增加了25%。同时,由于整个医疗保健系统都投入到抗击冠状病毒感染的斗争中,精神卫生服务严重减少。

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俄罗斯联邦特别重视预防。精神病的治疗是有保障的,由国家免费提供并支付费用。在此情况下,我国代表团一心想就这份注重行动的文件达成共识,并采取了建设性的态度。遗憾的是,最终天平倾向于将人权和性别问题纳入医疗保健这一特定部门。

同时,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则被排除在外。有28个代表团提议在案文中列入一个段落,提及非法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精神健康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提议遭到忽略。我们对优质精神病治疗的普及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示不安。这不仅会使在全球层面执行该决议的规定变得复杂,而且会使在国家政策中适用该决议以及在多边进程中使用该决议的案文变得复杂。

Mozgovaya夫人(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白俄罗斯谨感谢墨西哥代表团介绍第77/300号决议。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因此加入了协商一致意见。

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谈判进程的每个阶段都得到各代表团广泛支持的关于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医疗保健部门的影响的段落,没有列入文件的最后草案。显然,由于缺乏相关规定,该决议未能反映受制裁国家的居民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会影响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供应,使国

际支付和物流复杂化，并危及最有需要的人所需药品的供应。

白俄罗斯坚定地致力于确保全面的医疗保险，特别是在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领域。为此，白俄罗斯在国家层面采取了必要的法律、组织和经济措施。

我们肯定世界卫生组织在解决全球医疗保健问题方面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同时，白俄罗斯重申国家自主原则，重申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和国家优先事项确定本国确保全民医疗保险的道路方面的关键作用。

Asaju夫人（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墨西哥和核心小组协调第77/300号决议。我们同样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技术支持。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这项决议对于确保向有精神障碍者和社会心理残疾者提供充足、便捷、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治疗和护理极为重要。我国代表团支持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议。我们欢迎对序言部分第19段（之二）中一些非协商一致措辞所做的修正，这些措辞涉及性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殖权利，容易引起误解。尼日利亚敦促我们保留通过谈判商定的措辞。我们同样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得到28个代表团压倒性的支持并经过若干次双边磋商，但提议的唯一涉及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措辞却没有纳入最后文本。这表明，一些代表团得到了优于其他代表团的待遇。必须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性别”一词是指男性和女性。我们与其他代表团一同提议替换该词，但遭到拒绝。

我们要重申，决议纳入的一些可能引起误解的非协商一致措辞将根据我们本国的优先事项和法律来解释。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在决议通过后解释立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128的审议。

议程项目132（续）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秘书长的报告（A/77/910）

穆萨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秘书长提交关于该议题的报告（A/77/910）。

报告审查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引发暴行罪的风险、原因和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变得更加分裂、不妥协和不宽容的同时，全球各地的人民继续遭受冲突、被迫流离失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不平等、不安全、贫困和气候变化之苦。仇恨宣传、虚假信息和旨在建立单一族裔社会和鼓吹族裔不相容、非人化和种族优越思想的政策，继续助长以身份认同为由的不容忍，破坏社会稳定，削弱和平共处，并大大增加暴行罪的风险。对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缺乏问责破坏了法治，也是致使冲突和暴力旷日持久、规模扩大或死灰复燃的条件之一。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实施大规模侵害行为的倾向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源于原本已经存在的系统性侵害和有罪不罚的模式。

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应继续促进宽容和尊重的文化，动员全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对抗各种仇恨以及煽动歧视和暴力的行为。此外，向受冲突影响和参与冲突后建设和平、重建、恢复和重返社会的国家提供支持，并采取措施确保其边界安全，防止出现可能为实施暴行而进行的非法跨界活动，必须始终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一项重要承诺。

讨论中的此项议题对我国和我们整个地区都特别重要。邻国亚美尼亚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占领阿塞拜疆的主权领土近30年，阿塞拜疆的这一经历说明并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预防和解决冲突，确保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打击严重罪行不受惩罚的现象，反击仇恨，建设和保持和平。我国所受侵略的核心为长期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后

果不言自明。数以千计的阿塞拜疆平民在大屠杀中被处决，许多俘虏遭受残暴的酷刑。20多万阿塞拜疆人遭到驱逐，至今仍无法返回他们在亚美尼亚境内的世居故土。此外，在所有被占领土上，70多万阿塞拜疆人遭到族裔清洗。我国数百个城镇和村庄被夷为平地，阿塞拜疆文化遗产在整个亚美尼亚和前被占领土上遭到抢劫、破坏、亵渎和摧毁。继战争在2020年秋划上了期待已久的句号之后，阿塞拜疆在解放领土上开展大规模恢复和重建工程，以确保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家园并享有高水平生活，同时阿塞拜疆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彼此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本着诚意启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然而，尽管对话正在持续进行并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但严重的挑战依然存在。亚美尼亚拒绝从阿塞拜疆领土上完全撤出其残余武装部队，经常违反停火，坚持其领土主张，继续进行仇恨宣传，且无视2021年12月7日国际法院的命令，允许种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在其领土上开展活动，筹集资金，公开散布仇恨言论，招募和训练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参加战争和实施大规模暴力。此外，亚美尼亚拒绝透露它在阿塞拜疆领土上埋设的数十万枚地雷的位置。因此，在冲突后时期，自2020年11月以来，已有57名阿塞拜疆公民因地雷爆炸身亡，247人受伤。亚美尼亚必须分享关于所有雷场的准确、全面的资料，并停止且不再从事地雷恐怖主义。此外，提供更多国际支助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阿塞拜疆的国家地雷行动工作对于拯救生命和确保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家园至关重要。

此外，除了少数因战争罪行、恐怖活动和雇佣军活动而被阿塞拜疆绳之以法的人之外，大多数犯罪者继续逍遥法外，因为亚美尼亚无意起诉和惩罚他们，也无意就自己的侵权行为作出赔偿。

因冲突而失踪的近4000名阿塞拜疆公民，包括719名平民，至今下落不明。在已解放的领土上发现了几个集葬坑，这表明，有阿塞拜疆平民和其他受

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遭蓄意杀害。尽管如此，亚美尼亚仍无意对失踪人员下落作出说明。

我们坚决反对亚美尼亚代表在早些时候就这个议题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言论（见A/77/PV.83）。我必须提醒大会，亚美尼亚执意提及的所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早已不再是一个行政和领土单位。该地区是阿塞拜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30年来一直被亚美尼亚非法占领。该地区的法定名称是“卡拉巴赫经济区”。亚美尼亚必须记住这个名字，永远不要忘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美尼亚种族单一，其核心观点仍然是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根本不相容，国际恐怖分子、战争罪犯和种族主义理论家在那里被奉为民族英雄，而它却大肆谈论其他国家的人权和少数民族。亚美尼亚就所谓的拉钦-汉坎迪公路遭封锁事件发出的指控是编造的、挑衅性的。阿塞拜疆从未对居民在这条公路上自由通行或为人道主义目的而使用该公路设置障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大量记录在案的证据，这些证据让人们看到，亚美尼亚在捏造事实。

亚美尼亚无论在法律、政治或道义上都没有理由就阿塞拜疆主权领土或属于我国专属权利、权限和责任范围内的事项发表任何声明或评论。相反，亚美尼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阿塞拜疆决心继续努力推动该地区冲突后建设和平、和解、重新融合、和平共处与发展，确保伸张正义，并大力提高国家能力，以便尽早发现、预警、预防和应对其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以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的威胁。

Khaddour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以“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7/PV.83）。我们还注意到文件A/77/910所载秘书长的报告，并要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我国代表团重申,广义或扩大化的保护责任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应被视为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其主要核心是存在着在国际上应用现有法律规则的道义和政治承诺。因此,这一概念并未上升到国际法律规则——无论是公约还是习惯法——的层次,也没有在国际法承认的有关灭绝种族罪行、危害人类罪行、战争罪行和族裔清洗的现有权利和义务之外增加新的权利或法律义务。

第二,保护责任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具有政治性质的一般概念,并不构成《联合国宪章》所牢固确立的国家主权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或禁止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例外情形。这一概念并没有赋予安全理事会新的权力。无论有无这一概念,安理会都可以根据《宪章》的规定,行使其权力,包括诉诸武力,以保护平民,对抗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

此外,保护一国人民免遭灭绝种族罪行、战争罪行、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行之害的责任主要由当事国承担,属于行使主权的范畴。保护责任概念的主要出发点是防止大规模暴行,不应被视为军事干预概念的同义词。即使使用武力似乎是履行保护责任的必要手段,也必须考虑到国际法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既有原则,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是安全理事会的批准。

第三,军事干预,无论其动机和理由为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结果和影响,其严重性可能远超引发此类干预的局势本身,因为它们可能延长本应得到解决的危机。干预可能引发新的冲突,使平民在干预行动旨在制止或防止的屠杀之外遭受其他形式的屠杀。此外,此类干预往往导致受干预国沦为失败国家,充斥血腥冲突,而这些冲突会危及有关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国内和平与稳定,并可能以一个国家分裂成几个更容易控制的族裔或宗教国家的结局告终。

毫无疑问,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偏离保护平民的既定目标,转而以推翻国家政权为目标之后,保护责任概念今天在国际上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不容忽视。此种偏离绝对与保护责

任概念无关。其结果是,国际社会对这一较新概念的支持减少,而这一概念长期以来一直被滥用,各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任何试图宣扬干涉他国内政——包括以保护责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类似概念,必须持不容忍的态度。

第四,保护平民,使人类免遭国际战争和暴行的祸害,是我国与所有会员国的共同目标,这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国际法的规定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真诚建立国际关系以及发展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友好关系等原则。其他需考虑的因素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合作;努力消除贫困、边缘化和歧视;以及立即取消不人道单边强制性措施。这些因素有助于防止冲突和侵犯行为,同时促进和平与宽容的文化。

然而,在保护责任问题上的政治化和选择性做法为外国干涉、政权更迭以及用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强推某些国家的议程和利益打开了大门。安全理事会某些成员国企图将其选择性政策和双重标准强加于安理会,这将进一步损害《宪章》赋予安理会的作用。

最后,许多试图将保护责任概念强加于联合国所采用方法的国家政府几十年来无视以色列对戈兰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我们人民的占领做法,包括定居点政策、战争罪和对平民施以酷刑,这些都明显、严重违反了国际合法性和安全理事会决议。这些政府还无视招募、资助和协助转移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行为,这些人加入了我国叙利亚一直在打击的恐怖组织,而我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国家责任。正是这些政府阻碍了我国危机的政治解决。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实施不公正的封锁和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剥夺了叙利亚公民的基本生活和保健服务。令人遗憾的是,这是政治和道德虚伪的极致。

希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奥科斯-奥博介绍秘书长的报告(A/77/910)(见A/77/PV.83)。

18年前,大会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宣布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两年前,大会决定将该项目列入年度议程。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我们继续看到在世界各地许多局势中有人犯下暴行。我们赞赏秘书长的报告聚焦于暴行罪的风险和驱动因素以及预防的重要性。

正如秘书长敦促的那样,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必须作出更多努力来应对可为暴行创造条件的风险。至关重要,我们要继续处理粮食不安全和贫困问题,更广泛地说,要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从而帮助降低发生暴行的风险。我们必须着重关注和努力应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暴行。关键基础设施常常成为武装行为体的目标,平民被迫离开家园去寻找供电、自来水和食物供应。

卡霍夫卡大坝因为洪水被毁,造成全球影响,平民首先受到冲击。大坝受到的破坏还危及扎波里日亚核电站的运作,并破坏了一些农田和设施,这将进一步阻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依赖的粮食生产。我们还看到俄罗斯使用伊朗提供的神风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各地的城市,杀死数百人,摧毁学校、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此外,自2022年2月全面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导弹一直以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

今年4月,缅甸军方对Kanbalu镇的一个村庄进行了空袭,造成16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十名儿童。该政权的暴力和压迫使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长久持续,有报告显示,自政变以来,已有3600多人被杀害,19000人被拘留,150多万人流离失所。我们不要忘记2016年和2017年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灭绝种族和危害人类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继续在新疆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

犯下灭绝种族和反人类罪。针对新疆的局势,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根据其预警系统和紧急行动程序行事,于2022年11月将此事提请秘书长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关注。

美国最强烈地谴责当前在苏丹发生的侵犯人权和践踏行为以及可怕的暴力,特别是关于快速支援部队和同盟民兵在西达尔富尔基于族裔理由的广泛性暴力和杀戮的报道。西达尔富尔和其他地区发生的暴行是不祥的信号,让人们想起那些最终使美国在2004年认定达尔富尔发生灭绝种族行为的可怕事件。我们要特别谴责6月14日西达尔富尔州长哈米斯·阿巴卡尔遭到杀害一事,此前他指控快速支援部队和其他部队实施灭绝种族行为。虽然在达尔富尔发生的暴行主要是快速支援部队及其附属民兵所为,但双方都对滥用武力行为负有责任。在达尔富尔,苏丹武装部队未能保护平民,据报道,他们鼓励各个部落动员,助长了冲突。

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护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的第2573(2021)号决议谴责了冲突地区威胁或伤害平民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暴力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否是蓄意的。根据该决议,这些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武装冲突各方必须立即停止这种做法。该决议还要求各方充分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并敦促各方保护民用基础设施。所有国家和武装团体都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并采取良好做法,以减轻和应对平民和民用物体受到的伤害。

为了不断改进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政策和做法,美国发布了《减轻和应对伤害平民行为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包括在美国的行动和美国领导的多国行动中减轻和应对平民所受伤害的理论、指南和程序。美国仍然致力于履行保护平民的义务,并推动对暴行责任人的问责。

卡伊纳穆拉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乔治·奥科斯-奥博先生的通报(见A/77/PV.83)。我也感谢在我们之前发言的会员国代表。

我们赞同以保护责任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7/PV.83）。

保护责任有力地提醒我们，我们负有保护人类的共同责任。我们今天关于保护责任的辩论不应仅限于纸上谈兵，而应着眼于推动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大规模暴行罪的出现。在这方面，应当指出，就在上周一，我们纪念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此次活动突出表明了仇恨言论不受控制的严重后果并有可能诱发大规模暴行。今天，仇恨言论继续在我们的社会中扩散，暴力不断升级，无辜平民面临的风险逐日上升。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边缘化群体，打击仇恨言论。

我们必须强调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以及特别顾问所做的出色工作。他们的力量对于打击那些破坏性言论是不可或缺的。卢旺达多次重申，需要加强对该办公室和特别顾问的支持，他们为防止大规模暴行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所有人给予肯定和加强。

我们感谢秘书长提交2023年关于保护责任的全面报告（A/77/910）。大规模暴行罪与更广泛的发展主题之间的关联性突出表明，我们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冲突的根源上。通过了解这些触发因素，我们可以更有效、更具先发优势地进行应对，以减轻未来发生的暴行。在这方面，卢旺达敦促秘书长在今后的报告中纳入对以往建议落实进度的审查，以及对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族裔清洗方面新趋势的分析。

如之前发言者所述，保护责任原则有三大支柱：国家责任，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及及时果断的应对。不幸的是，今天我们正实时目睹这些支柱摇摇欲坠。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面临的局势令人气馁。通过学校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仇恨言论和反讲卢旺达语的人的情绪不断升级，正在造成巨大伤害，加深社会之间的分裂。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艾丽斯·恩德里图女士和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

尔·巴切莱特女士就此发表了声明，但只有声明是不够的。

这些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对个人和社区造成的直接伤害——它们为大规模暴行罪的发生打下了危险的基础。将治理责任放在首位至关重要。要采取预防行动，就必须承担责任，并推动对仇恨言论采取零容忍态度。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要求将追究责任作为防止暴行罪的一种手段。

第三支柱要求作出及时、果断的反应。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当前局势已超出作出这种反应的门槛。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群讲卢旺达语的妇女最近遭到围捕、袭击，并被诬告在刚果人中传播艾滋病毒。这种污蔑、剥夺人性和迫害的行为亟需大会关注，并且必须予以抨击。

我们正处于紧要关头。我们再次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重视所报告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一场灭绝种族事件。团结起来，我们拥有改变这一发展态势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共同义务。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因为没有行动的对话无异于伤害我们必须保护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坚定、具体的办法来防止世界各地发生大规模暴行罪。让我们踏上和平之路，确保保护责任从纯粹的理论转变为所有人都看得到的现实。

最后，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肯定并支持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为遏制暴力浪潮和保护无辜平民所作的努力。我们必须将集体言辞转化为一致行动，以确保实现所有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Sekonyana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确认召开这一年度辩论会的重要性，以及重要的是，确认秘书长就此问题提交年度报告（A/77/910）的重要性。我感谢他提交了今年题为“发展和保护责任：认识和处理暴行罪的内在风险和驱动因素”的报告。此外，还必须赞扬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和保护责任办公室以及防止灭绝种族

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的授权任务所发挥的补充作用。

南非同意秘书长的评估,即尽管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接受了这一基本准则,但会员国、国际社会和其他行为体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以此作为一种防止未来发生暴行罪的手段。因此,作为国家和国际社会,我们有义务承诺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为此订立促进和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的各种方法和方针。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所所述,这种发展可以用来实现保护责任的主要目标。

众所周知,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所界定的保护责任概念着重指出,国家负有保护其人民免遭暴行罪,即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族裔清洗罪的责任。今年提交的报告进一步审视了发生这些罪行的根源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必须要认识到,极端贫困和不平等构成结构性风险,可能促成滋长暴行罪的环境,特别是在伴有政治不稳定、歧视和社会冲击的情况下。

报告认为,国家在确保通过可持续发展方法维持一个避免此类犯罪的环境以及解决歧视和不平等问题方面仍然至关重要。报告同样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之间建立起根本联系。我们确认,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能够加强和保护人权,因为它们可以建设社会,让民众受到保护。在这方面,南非还要重点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政策和歧视使得渐进式侵犯人权行为演变为暴行罪。一个国家或其他行为体不会自发开始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是在已发生侵犯人权的状况下发起行动。当身份政治被用于歧视和孤立某一特定群体时,尤其如此。报告重点指出:

“在灭绝种族过程之前(或该过程中)明显存在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剥夺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公民权利,将目标群体排斥在社会之外,否认这些群体的基本人性”(A/77/910,第18段)。

这些被剥夺的权利往往直接关乎一个群体或社群的发展和进步,当一个特定的身份或群体被剥夺这些权利时,这种剥夺权利的行为应成为一个预警信号。

第二,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预防暴行罪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对保护责任敏感的经济方法本身就是一种预防歧视和打击不平等现象的机制。解决和消除贫困可以避免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并阻止基于身份的歧视。南非还认为,透明、可问责的治理结构——如可持续发展目标16所确定的那样——以及经济体当中对资源的有效管理有助于减少可能导致不稳定的矛盾。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加强《联合国宪章》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的工具。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联合国会员国承诺保护民众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然而,自那时以来,冲突已经迥然不同,变得更加复杂且多层面。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创新手段来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避免诉诸更严厉的最后手段的一个重要工具。

第四,国际社会可以利用《宪章》和会员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所提供的多种工具来防止剥夺人权、发生冲突及最终走向暴行罪。这种发展方法应该对暴行罪具有敏感认识,如果可持续发展和筹资没有在人权和问责治理的文化中得到公平引导,就有发生这种罪行的可能性,对此也要有敏感认识。在这方面,南非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确认,所有发展行为体,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发展系统,都必须开展全球合作,以鼓励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键支柱。

我们还应当指出,报告对稳定时期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作了实质性阐述。为此,南非赞同报告特别确认,安全部门改革,包括有效解除武装和监管武器流动,既是一项预防措施,也是一项长期发展目标,同时确认安全与发展之间的交叉性。

应鼓励各国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平等、重视差异和多样性并拥有识别和应对早期预警的系统的社会。因此，保护责任非常明确地与可持续发展相契合。此外，南非将继续支持通过以人权为中心的强有力的发展议程，置预防于首位。

最后，我谨借此机会重申，南非始终致力于促进和执行保护责任的各项文书，并进一步肯定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细节。特别是，南非赞赏报告体现了包容性，它确定了若干具体行动，不仅可以防止此类罪行，而且可以投资于国家早期发现和预防以应对暴行罪的能力。

南非作为保护责任协调人全球网络、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安全部门改革之友小组的成员，将继续利用这些平台来促进和优先考虑谈判、斡旋、调解、仲裁等和平手段来应对受冲突影响国家面临的任何挑战。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共同努力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时，今天的这次全体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非常赞赏今年的报告将发展与暴行罪联系起来，并认识到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争夺是加剧社会中歧视现象的驱动因素。

保护责任原则的实行不应带有选择性，而应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这也是所有国际准则和法律框架的应有之义。这一点通过开诚布公的辩论得到了加强，这种辩论对认识我们当前的不足之处至关重要，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向前迈进。

莫里科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并赞扬秘书长提交了关于保护责任与发展之间关联性的富有启发性的报告（A/77/910）。

毫无疑问，贫困和大规模暴行相互关联。保护责任仅通过其威慑作用就有助于促进和平与稳定，而和平与稳定是任何类型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强调的那样，国际社会和各国有机会通过消除助长暴力驱动因素的贫

困、失业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来预防冲突和与之相关的大规模暴行，这些驱动因素包括仇外心理、仇恨言论和不容忍。

如今，不平等在加剧，世界财富的一半仍然集中在仅占世界人口1%的人手中，我们不能说我们正走在正轨上，除非按照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2）中提出的建议，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为各国提供更有利的投资机会，以减少失业和贫困。

在2012年加入保护责任之友小组时，科特迪瓦意在重申我们恪守作为结束大规模暴行关键机制的原则。然而，近年来的事件中，联合国已沦为武装冲突和持续不安全局面的一个近乎被动的见证者，各行为体对人道法和人的生命愈发漠不关心，迄今已迫使1亿多人流离失所。

这种态势使我们更加坚信，有必要改革安全理事会这一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保障者，使其更具代表性。这将需要改进其工作方法，包括就可能导致暴行罪的局势向安理会通报情况；通过《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行为守则》，其中呼吁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禁用否决权；并支持法国—墨西哥关于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

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就连最局部性的危机的效应也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需要寻找办法来防止主权原则被用作对大规模暴行实施者，包括那些将饥饿和强奸用作战争武器或蓄意将民用基础设施作为袭击目标的人不予以惩罚的借口。

在这些情况下，在让各国承担首要保护责任的同时，国际社会应当为自己提供法律、司法和军事手段，做法包括增加维和行动的预算，以制止暴行罪、起诉施暴者和赔偿受害者。

我国仍然坚信，预防冲突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最好办法。为此，联合国必须依靠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各级的预警机制以及民间社会，同时确保它们获得必要的财政和技术援助。

就我国而言,我们采取了立法和体制措施,并建立了监测和提高认识机构,以应对大规模犯罪的风险。这些机构包括视听传播高级管理局,该局寻求防止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仇恨言论;国家人权理事会和团结与社会融合观察站,它们提高对仇恨言论的认识;以及打击网络犯罪平台,该平台追踪并惩处仇恨言论散布者。此外,我国认识到,要预防冲突和暴行,就必须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于是把社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计划,重点关注青年,并制订有一项涵盖2021年至2025年期间的投资计划来促进青年的职业融合,目标是到2030年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支持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并鼓励他继续就可能引发冲突和大规模暴行罪的局势提供信息和分享分析。

查特努奇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的开场白,并表示我们继续支持秘书长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斯洛伐克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和保护责任之友小组所作的发言。

我愿从我国的角度补充几点意见。

斯洛伐克欢迎秘书长的第十四次报告(A/77/910),这次报告侧重于发展与保护责任之间的重要联系。然而,像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要鼓励秘书长在其未来的报告中纳入对以往报告建议落实情况的评估以及国别分析。在今天的辩论中,请允许我简要地集中谈三点。

第一,关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贫困、长期制度化歧视、教育较差、经济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以及腐败和缺乏善治,都是暴行罪的重要风险因素。处理这些因素需要成为我们预防暴行政策的核心所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合作实现更美好和更可持续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框架,并能大大促进预防暴行的努力。然而,正如秘书长报告所概述的那样,只有约1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即将举行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和随后的未来峰会是大好机会,我们可藉此不是加倍而是三倍地作出努力和承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预防是保护民众免遭暴行罪这项责任的最重要部分。除了我所谈的第一点之外,我还要强调预警系统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预防暴行罪工作中的重要性。为了促进预防暴行罪,预警信息必须被纳入能够促成采取适当对策的进程。在当地或国家未作出反应的情况下,如果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能够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们回顾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以及法国和墨西哥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行使否决权问题的倡议。

第三,关于追责,如果防止暴行的努力不成功,就必须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以防止暴行复发。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机构的作用。当国家司法机构不能或不愿履行其首要义务时,国际刑事法院就会介入进来。斯洛伐克借此机会鼓励所有尚未批准《罗马规约》及其修正案的会员国批准这些文书。《罗马规约》二十五周年是一个理想机会,我们可藉此表明我们共同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我们还再次呼吁向前迈进一步,制定一项新的关于预防和惩处危害人类罪的全面公约。今年早些时候在第六委员会内进行的公开和广泛的讨论令人鼓舞。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促成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采取具体行动。

斯洛伐克还赞扬最近通过新的《卢布尔雅那-海牙公约》,该公约旨在通过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间合作框架来加强各国调查、起诉和惩处最严重国际罪行实施者的首要责任。在我们未来的努力中,包括就危害人类罪条约所作的努力中,必须避免削弱我们的共同目标,那就是堵住有罪不罚漏洞。

最后,我不能不提到我们的邻国乌克兰的局势,在那里,有人实施了暴行。阻止进一步实施暴行的

简单快捷的办法是俄罗斯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并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全境撤出所有部队。我们敦促俄罗斯这样做。

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专题辩论会,并感谢秘书长提交关于保护责任的报告(A/77/910)。

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保护责任的概念被作为一种旨在防止大规模暴行和保护弱势民众的崇高人道主义理论提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在保护责任的理由及其原则的适用中都存在固有的双重标准和政治考量,而这有损其公信力和客观性。

有充分证据表明,许多情况下,保护平民的军事行动迅速转变为所谓的政权更迭,进一步破坏了国家的稳定。这种滥用保护责任概念的行为,不仅暴露了以进行干预以保护平民责任为幌子追求地缘政治利益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还凸显了保护责任概念的内在弱点。

保护责任的概念除了被滥用外,还招致批评,称一些国家没有援引这一概念,在谴责所谓战略盟友犯下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或在安全理事会追究其责任方面也表现得犹豫不决。保护责任肯定适用的一个具体情况是在外国占领或外国统治的情况下,例如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或印度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那里充斥着紧迫的人权紧急情况,往往等同于灭绝种族罪和其他类似罪行,但要求进行干预以保护民众的声音却安静得令人不快。

70多年来,印度违反安全理事会规定举行自由和公正公民投票的多项决议,剥夺了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印度部署了90万部队,采取法外处决、强迫绑架、集体惩罚以及监禁所有党派自由会议全部政治领导人的做法,而自由会议是克什米尔人民的真正声音。过去,巴基斯坦还分发过一份详细的档案,其中载有印度官员在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犯下的3432起战争罪行的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了两份报告,列举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

情况,并建议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

国民志愿团自豪地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希特勒纳粹划等号,并号召迫害印度的穆斯林,就像犹太人被迫害一样。今天的印度政府在同一理念的启发下,正在领导一场有系统的运动,清除印度——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被占领土——上丰富的伊斯兰遗产的所有残余。国民志愿团对1992年在孟买、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以及2021年在德里对印度穆斯林的有组织大屠杀,以及1992年破坏历史悠久的巴布里清真寺和在该场址上建造印度教寺庙负有责任。

在今天的印度和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对穆斯林的迫害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迫害行为的清单还在不断变长。然而,就在最近的星期六,在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访问印占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期间,印度军队人员袭击了克什米尔南部普尔瓦马地区的一座清真寺——当时正有穆斯林在祈祷——并强迫这些穆斯林违背他们的意愿呼喊某些口号。

灭绝种族问题观察组织的创始人格雷戈里·斯坦顿最近警告我们,在印度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在印度可能发生种族灭绝。国际社会,特别是保护责任的倡导者,必须认真分析印度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被占领土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性人权状况。

保护责任的概念产生于这样一种期望,即国际社会将采取行动保护处于危险中的人。然而,在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考虑的驱使下,有选择地适用保护责任,加上这一概念中某些根本的模糊之处,损害了其作为真正人道理论的公信力。要真正坚持问责原则和保护弱势群体,就必须采取更加细致和平衡的办法,避免选择性,并且促进客观性和公正性。

阿莫林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大会主席召开今天关于保护责任的正式辩论,使会员国有机会反思和评估为防止危害人类罪和大规模暴行已经和将要作出的努力。在我开始代表我国发言之前,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

克罗地亚代表以保护责任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7/PV.83）。

我们欢迎并赞赏提交了题为“发展和保护责任：认识和处理暴行罪的内在风险和驱动因素”的秘书长的报告（A/77/910），该报告强调贫穷、制度化歧视、缺乏受教育机会、经济和两性不平等以及社会排斥是暴行罪的风险因素。事实上，赤贫造成缺乏机会、争夺资源以及社会内部的严重不平等，从而可能加剧群体之间的不满。

一些最有效的防止暴行政策是那些旨在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加强治理的政策。同样，《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合作实现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建设更先进的社会来解决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从而为预防暴行的努力做出重大贡献。建设更具复原力的社会特别需要尊重法治，以及不加歧视地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人权。这方面的关键是要有合法、可问责和包容各方，同时确保所有人都有诉诸司法的机会的国家宪法。

尽管在2015年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取得了初步进展，但各种全球性挑战，如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持久影响、武装冲突、气候紧急情况以及金融、粮食和能源危机，导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停滞或逆转，并已成为助长武装冲突的因素。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暴力、大规模暴行和流离失所，尽管为防止冲突升级和保护民众作出了集体努力，但目前全世界仍有1亿多人因冲突、迫害和暴行而流离失所。

建设和平委员会尤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跟踪基本发展指标，支持各国从冲突和暴行罪向可持续和平过渡。会员国应探讨与建设和平委员会进一步接触的可能性，委员会可以协助各国并就如何履行与保护责任有关的义务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我国代表团还想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利用其工作方法，尽早审议那些有可能涉及暴行的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举行有关保护责任、暴行罪的威胁以及安理会防止这些罪行的作用的公开辩论

会，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定期通报情况。

此外，我还想指出，作为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一员，乌拉圭申明，我国支持建议围绕保护民众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以及危害人类罪的决议草案，制订安全理事会的行为守则。我们也认可法国-墨西哥要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自愿停止使用否决权的声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授权，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因而它必须尽一切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平民和防止暴行罪。从部队派遣国代表的角度来说，我谨强调维和特派团的作用，它是我们保护平民免遭暴行罪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乌拉圭认可保护责任的三个支柱。我们优先处理与预防有关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支柱，因为这是担负起保护责任的最有效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支持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的工作，并鼓励他们与会员国分享对正在形成的危机的分析，并向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人权理事会提出防止暴行方面的建议和发出预警。人权理事会及其多种机制的工作、包括普遍定期审议、特别程序、条约组织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的技术援助的重要性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所有这些机制在对风险发出预警、识别大规模暴行罪的迹象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我们强调预警必须在这些情况下发挥的核心作用。

最后，乌拉圭重申对保护责任的承诺，并呼吁努力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以推进妥善落实该承诺。

莫雷蒂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们各国领导人于2005年商定，各国负有保护其本国民众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首要责任。这是保护责任的概念依据的第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强调了国际社会在提供合作与援助方面的作用，以使国家能够开发本地的实力，从而有能力尽到这种责任。第三个支柱仅适用于例外的情况，受到实物、时间以及形式上的限制。如果和平手段

不足、国家当局显然保护不了其民众，则国际社会可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集体行动，以保护民众免遭严重犯罪的影响。保护责任既未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中做出规定，也不反映习惯国际法。它是联合国集体使用的一个政治概念。

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把保护责任的概念用作采取单边胁迫性措施、干预内部事务或进行政权更迭的借口。任何国家均无权援引这个概念，为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开脱。此外，国际社会在履行保护责任时，必须在保护的同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任何集体行动均应基于已商定的一整套根本原则、框架以及程序，如注重预防，包括预防外交和穷尽保护平民的一切外交、人道以及其它和平手段。使用武力是最后付诸的措施，而且必须始终遵守国际法。

我们骄傲地联署了把保护责任这个项目纳入大会年度议程的第75/277号决议。该决议确认，大会凭借其广泛和具有代表性的组成而成为讨论保护责任的主要场所。该决议的通过还表明，我们承认，有必要集体讨论保护平民免遭相关罪行的问题。

我感谢秘书长和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提出今年关于发展与保护责任的报告（A/2023/910）。2011年，安全理事会曾在其主席声明S/PRST/2011/19中强调，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相辅相成，对于实现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它承诺，三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具有多种层面，要因因地制宜。贫困并不总是导致暴力，但是，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上的排斥可引发暴力和冲突。重要的是要强调，发展不足与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或者危害人类罪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关于报告中提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6，相关审议必须与所有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一道进行。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6所做的任何努力必须被纳入必然涵盖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层面的更广泛努力。要防止保护责任所涉的罪行，就有必要采取一种综合做法，加强政治、安全、发展、人权以及法治活动之间的协调连贯。在这方面，建设和平

委员会处于有利位置，可通过在和平安全努力与发展解决方案之间发挥衔接作用，并通过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合作来调集国际支持，协助弥补缺口。它必须始终保持其需求驱动的做法，并与建设和平优先事项相吻合。

巴西再次表示关切的是，秘书长的报告再次使用“暴行罪”一词来提及与保护责任相关的骇人行径。正如巴西在以前的发言中强调过的那样，会员国和联合国应抵制增加和使用不准确概念的诱惑。

“暴行罪”一词未在国际法或多边决议或决定中做出界定。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提及的四种罪行无疑是暴行，但是不属于秘书长报告中所使用定义的其它罪行也是暴行。

秘书长的报告承认，粮食无保障是一个紧迫的发展关切。作为安全理事会粮食保障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共同协调方，巴西强调，粮食保障对于预防和解决冲突、减轻武装争端对最脆弱民众的影响举足轻重。武装冲突和粮食不安全会形成恶性循环，使民众和国家陷入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的困境。冲突造成被迫流离失所，破坏重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经常导致原本可以耕种的土壤退化。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阻碍可持续和平所必需的人类发展，并可能加剧对资源的争夺。我们需要打破这种循环，为此，我们需要在联合国三大支柱领域采取具体行动。我们呼吁加强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整合各种努力。

最后，巴西期待继续讨论最佳战略，以推进预防和应对保护责任所涉罪行，加强能力建设以及增加能够促进更具包容性、多样性和宽容的社会的长期措施。

Ekren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秘书长的报告（A/77/910），其中分析了发展与保护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感谢特别顾问向大会提交该报告。

2005年,会员国对保护民众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作出了重要承诺。然而,尽管各国和全球做出了努力,我们仍然在世界各地目睹严重的人类苦难、侵犯人权行为和人道主义危机。

全面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与发展能够有效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和防止侵犯人权行为的手段和能力密切相关。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报告强调歧视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模式是主要风险因素。今天,仇恨犯罪、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基于宗教的歧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做法违背尊重人的尊严、平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团结一致,打击基于宗教的恶劣的暴力和歧视行为,特别是打击正在惊人地上升的伊斯兰恐惧症。

另一方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仍然是所有国家妇女面临的主要威胁。冲突对不同地区的妇女和女童的严重影响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全面和包容性的方法加以解决。

秘书长的报告第二节分析了经济、社会、治理、冲突、人权和发展框架内暴行的主要风险因素和驱动因素。我们注意到,包括饥饿、饥荒和断绝粮食在内的粮食不安全被列为该节下的一个关键发展关切。就土耳其而言,它在应对和减轻粮食不安全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我们与联合国共同促成的《黑海谷物倡议》在为千百万人提供粮食供应和降低全球粮食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继续努力推动该倡议的顺利实施和进一步延长。

秘书长的报告将社会韧性面临的压力源列为暴行的主要风险因素。恐怖主义的确是对社会韧性的一大威胁。恐怖主义组织造成的不稳定和破坏不仅威胁生命、权利和自由,而且也威胁经济福利和社会稳定。理想情况下本应分配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却不得不用来弥补恐怖主义组织造成的损害。正如秘书长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的报告(A/70/674)所指出的那样,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是铲除恐怖主义的长期计划。因此,保护责任的范围必须考虑到打击恐怖主义组织。

我们欢迎今天审议的报告强调预防作为国家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预防是我们工具箱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当预防努力不奏效时,联合国机构应当介入,履行《联合国宪章》设想的职责。特别是,我们要着重指出安全理事会负有在大规模暴行局势中采取行动的责任。

保护责任尚未成为国际法既定规范,其范围和实施需要界定和完善。我们认为,这一界定必须基于国际社会尽可能广泛的共识,同时考虑到所有会员国的关切。这些努力应避免重新解释或重新谈判既定的国际法原则和现有法律框架。处理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国际条约为预防和惩治这些罪行提供了权威性和全面的法律框架。我们应该忠实和始终如一地落实相关的法律框架。

奥多内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同克罗地亚代表以保护责任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7/PV.83),我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表一些看法。

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关于发展和保护责任的报告(A/77/910)。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第9段中,各国元首确认,国际体系的三大支柱是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发展。该文件同一段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三大支柱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今天审议的这份报告不容置疑地表明了这三大支柱之间的深刻相互联系。正如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一样,没有发展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对和平世界的愿景不包括尊重人权,就更不会有和平。

我们不能不赞同秘书长的信念,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努力实现发展和预防的适当框架。发展显然使我们能减少产生大规模暴力行为的排斥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或一个长期目标;它是一个紧迫的问

题,必须作为紧迫问题来解决。它对实现一个和平世界至关重要。我们看到可怕的数字——数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报告表明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恶化,海洋资源日益匮乏。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路,除了更多的冲突和暴力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同样,我们不能不欢迎该报告断言,侵犯人权行为在助长暴力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都知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量极端主义政治言论,包括仇恨言论、不容忍、各种极端主义、歧视和排斥方面的言论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对国际社会如此艰苦努力建立的保护标准造成打击。

报告中描绘的图景既是路线图,也是行动呼吁。必须如此理解保护责任。它是呼吁所有国家履行我们的保护和预防义务。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联合国系统有一系列广泛的机构有能力发挥它们在预防方面的作用,我们不能对这些机构的潜力持冷漠态度。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潜力。

请允许我们指出,阿根廷大量使用这些工具。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是不得不忍受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之一。我们不会在这里解释后果,只是指出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前因后果的。然而,我们努力学习。第一个教训是,预防之路有始无终,最重要的是,预防是一场不懈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暴力根源并没有消失,只是处于休眠状态。所以,在战斗中,没有任何工具是多余的。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是有用的:国际体系的贡献、与民间社会的合作、将国际人权法纳入国内法以及新观点。

我们知道,预防首先是一项必须由各国开展的活动,它必须是全面的,每个国家必须制定一项它认为合适的战略。我们还认为,不管走哪条路,预防不是各国的选项,而是每个人都应履行的义务。但是,预防也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为什么我们重申致力于加强国际社会支持这项工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还要特别表示,我们支持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的工作以及两位特别顾问的努力。

最后,阿根廷要重申致力于并愿意继续努力及早预防暴行罪。我们有责任确保不发生暴行罪。

Greco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和克罗地亚代表以保护责任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7/PV.83),并谨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几点。

意大利重申支持保护责任原则。对保护责任的承诺首先是对预防和减轻最令人发指罪行的风险的承诺。暴行是可以而且必须预防的,应尽一切努力查明和解决暴行根源。

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这一项目的最新报告(A/77/910),并欢迎报告通过采用基于人权的方法,侧重于保护责任与发展之间的交叉点。我们需要预警机制以及结构性政策和全面战略,以便在尊重所有人人权的基础上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人权与和平是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根据我们的国家立法,发展合作承认人在其个人和社区层面的中心地位,并追求消除贫困、保护和实现人权以及预防冲突的目标;支持和平进程、和解、冲突后稳定和巩固;以及根据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原则和战略加强民主机构。

极端贫困、侵犯人权行为、薄弱的机构和有罪不罚现象可能是风险因素,需要在成为冲突、仇恨和暴力的实际驱动因素之前得到适当的认识、确定和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强我们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解决暴行罪根源的能力至关重要。

意大利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主席的身份欢迎安理会1月24日举行的特别会议,该会议旨在审议防止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社会和经济措施的潜力。那次会议强调,需要进一步发展我们关于通过社会经济措施预防暴行罪的知识。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集体努力。

特别是,我们欢迎自下而上的预防方法,并重申我们支持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正在开展的工作,其目的是与地方社区和基层组织接触,纳入地方自主权原则,并考虑到对性别问题

有敏感认识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方法，其方式涵盖各种议程，如与打击仇恨言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议程。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祝贺特别顾问办公室最近启动了《社区妇女打击仇恨言论和防止煽动可能导致暴行罪的暴力行为行动计划》（又称《那不勒斯社区妇女行动计划》）。该计划是一群社区妇女领袖共同努力的结果，她们于2022年7月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讨论保护、支持和增强站在预防暴行第一线的妇女权能的新方法。她们的共同努力导致起草了一系列建议，旨在推进这一非常雄心勃勃和富有挑战性的议程。

从各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处理保护责任议题，对于维护我们的集体承诺和杜绝挑战我们单独和集体预防努力的有罪不罚气氛至关重要。

库尔哈内克先生（捷克）（以英语发言）：捷克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代表保护责任之友小组所作的发言（见A/77/PV.83）。

自保护责任原则于2005年通过以来，捷克一直是该原则的坚定支持者。在我们即将迎来世界首脑会议二十周年之际，在预防和应对方面履行这一全球政治承诺仍然是一项共同挑战。然而，世界各地持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严酷地提醒我们，履行保护责任必须是整个国际社会努力的重中之重。

我们同意秘书长在今年的保护责任报告（A/77/910）中发出的信息，即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以及缺乏善治是暴行罪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预防应包括更广泛的努力，以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帮助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和保护弱势群体。

因此，在9月首脑会议上重申我们对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至关重要。还需要在人道主义-发展-和平联系的各个环节有效开展工作，我们在这样做时应更加注重和平支柱。我们在编制《新和平纲领》时，应该密切关注加强确定关键风险因素并制定应对一切形式暴力对策的国际能力。强调预防需要采取综合方

法，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其掌握的一系列工具来做到这一点。

首先，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会员国应履行其人权义务并建设这方面的能力。普遍定期审查、特别程序和其它机制在预防和预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包括人权捍卫者、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媒体在内的民间社会行动体在协助保护责任努力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为他们营造一个安全和有利的环境。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可以更有效地为执行保护责任原则做出贡献。首先，安全理事会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危机、保护平民、支持和平进程。我们完全支持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关于在发生大规模暴行时限制否决权的倡议。

我们支持这项任务，并赞赏秘书长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以及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的工作。就秘书长关于保护责任的年度报告而言，我们欢迎它纳入对以往报告中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评估，以及对暴行犯罪风险趋势的分析。

除了防止暴行罪行发生这一最终目标之外，国际社会还必须优先应对追究暴行责任的挑战——包括从灭绝种族和危害人类罪到战争罪。国家当局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始终如一地追求正义，仍然是培养倡导保护责任的全球问责文化的关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发言。我们将在晚些时候听取余下的发言者发言，日期待定。

有人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谨提醒各位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巴特女士（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又听到巴基斯坦代表团毫无事实根据、充斥着经不起推敲的恶毒宣传的发言，这段发言特别针对我国——在我们这个国家，民主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宗教

自由受到宪法保障,机构运转有力,政府政策的执行不存在基于宗教、教派、种姓或性别的歧视。巴基斯坦代表团随意使用“灭绝种族”这样的字眼,就好像戈培尔一样,试图转移世界对该国斑斑劣迹的关注。

然而,事实不言自明。事实是,巴基斯坦可能是唯一一个犯下灭绝种族行为,并且在几乎没有承认、更不用说道歉的情况下逍遥法外的国家。在昔日的东巴基斯坦和现在的孟加拉国,仍然留着灭绝种族深深的伤疤。事实是,也正如一些独立多边机构充分记录的那样,由于巴基斯坦顽固的政策,包括使用亵渎法,巴基斯坦的宗教和教派少数群体生活在恐惧状态中。我相信,肯定会在我们之后再次发言的巴基斯坦代表将对此只字不提。这应该不会让我们在座所有人惊讶,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看到过他们的行动。

至于他们自说自话地就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直辖区发表的看法,我不想答复,它不值得我这样做,因为众所周知,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直辖区以及拉达克都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包括目前被巴基斯坦非法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土。

伊贾兹夫人(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印度代表刚才的发言作出回应。

印度代表团没有谈到我国代表团提出的有关该国令人深感不安的人权问题轨迹的事实。相反,它令人遗憾地试图散布谣言和针对我国的宣传。印度将恐怖主义作为针对邻国的国策。由于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团狂热分子无法实现他们的“大婆罗多”梦想,于是试图招募、训练、资助和支持恐怖分子执行任务,推进他们在该区域破坏稳定的行动。

关于灭绝种族有什么可说的?在印度非法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印度本土,灭绝种族的威胁迫在眉睫。印度厚颜无耻地用一支90万人的占领军

粉碎克什米尔人合法的自决请求。我要在此重申,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国际公认的争议领土,不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复错误立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接受的。

根据安理会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决议,印度无权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改变该领土的地位。如果印度对国际法有任何尊重,如果它有道德勇气,就应结束恐怖统治,撤出军队,并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让克什米尔人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

蒋华女士(中国):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代表刚才在发言中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美方出于以疆制华的政治目的,声称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

什么是种族灭绝?美国自己心知肚明。美国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有目的、系统性地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和掠夺,导致印第安人口数量从1492年的500万锐减到20世纪初的25万。这是美国甩不掉的历史原罪。美国应正视自己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强制措施,停止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

在美、西方政治操弄下,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未与中方沟通核实,滥用所谓早期预警和紧急行动程序,依据虚假信息抹黑污蔑中国人权状况。中方坚决反对。

美国几十年来所谓的反恐军事行动已经造成约90万人死亡。美国以保护的责任为名,对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发动的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希望秘书长保护的责任特别顾问对此予以关注,并就追责提出建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132的审议。

下午6时散会。